

doi. 10. 3724/1005-0566. 20260701

“内卷式”竞争生成的底层逻辑、表现形态、影响及治理策略研究

王志章¹, 向志丹²

(1.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2. 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 东萨塞克斯郡 布莱顿 BN1 9RH)

摘要:“内卷式”竞争是资源约束、有效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不足、制度激励扭曲与主体短期化行为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状态,表现为竞争投入持续增加而效率、质量和福利未能同步提升。首先,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区分一般竞争与“内卷式”竞争,构建“市场压力—能力约束—制度推力—行为强化”分析框架,提炼其低收益、低质量、高消耗、高传导特征,并提出操作化识别指标。然后,进一步分析“内卷式”竞争在地方政府政策竞争、企业同质化竞争、平台经济流量与算法竞争中的表现,以及对行业秩序、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和多元主体权益的负面影响。最后,从统一大市场建设、供给侧改革、需求扩容、企业转型与行业自律、竞争法治监管5个方面提出治理策略,为破解产业内卷、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同质化博弈;供需失衡;创新不足;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6)07-0001-13

Study on the underlying logic, manifestations, impact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WANG Zhizhang¹, XIANG Zhidan²

(1. College of State Governa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BN1 9RH, UK)

Abstrac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s a state of low-level,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driven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resource constraints,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weak innovation capacity, distorted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the short-term behavior of market entitie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escalating competitive inputs without proportional gains in efficiency, quality, or overall welfare. Contextualized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from norm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arket pressure-capacity constraints-institutional push-behavioral reinforcement.” It identifies key characteristics, low returns, low quality, high consumption, high transmission, and proposes oper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dicators. Furthermor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phenomenon’s manifesta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competition, corporate homogenization, and platform economy algorithms, highlighting its detrimental effects on industry order, corporate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takeholder rights. Finally, to dismantle industrial involution,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al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综合效果评价及政策优化研究”(24ASH008)。

作者简介:王志章(1956—),男,汉族,湖北当阳人,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减贫合作等。通信作者:向志丹。

econom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macro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propos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across five dimensions: unified market constructi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demand expansion,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combined with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and the legal supervis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Key word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supply-demand imbalance;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2026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部署经济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一部署表明,“内卷式”竞争已不只是局部行业的竞争失序问题,而是关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治理议题。当前,“内卷式”竞争已从农业、教育等传统领域,延伸至制造业、数字平台、地方招商、人力市场等经济场景,集中表现为同质化布局、低水平扩张、无效内耗和跨域传导。此类竞争扭曲资源配置,压缩企业利润和研发空间,削弱市场主体创新动力,阻滞产业结构转型,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要求不相适应^[1]。因此,有必要从生成逻辑、表现形态、影响和治理策略等方面,对“内卷式”竞争进行系统分析,为规范竞争秩序、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内卷式”竞争的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

(一)“内卷式”竞争的文献综述

“内卷”(involution)概念经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2]于 1963 年对印尼爪哇岛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被系统阐释并广泛传播,其核心在于揭示一种“无发展的增长”现象,即经济社会主体在资源约束下,持续增加投入但整体收益与发展质量未能同步提升,最终形成“投入增加—收益递减—再投入维持”的低效率锁定格局。这一理论为解读经济领域的非良性竞争提供了核心分析视角。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从资源约束、集体行动、信息不对称、制度失灵和创新激励等角度解释低水平竞争的形成机制。其中,集体行动理论有助于说明个体理性选择可能导致行业整体非理性结果^[3];信息不对称理论揭示了产能盲目扩张、路径同质化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失灵根源^[4];制

度经济学强调规则供给不足和激励结构扭曲会降低创新竞争收益,诱导企业转向低成本、低质量竞争^[5];Philippe Aghion 等^[6]则补充了技术创新视角,认为过度同质化竞争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并削弱创新激励,可能固化低水平竞争均衡。这些研究为理解“内卷式”竞争中的资源错配、制度扭曲和创新弱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国内研究则更加注重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语境下的现实解释。黄宗智^[7]关于“无发展增长”的讨论,为理解产业内卷和治理内卷提供了历史参照;林毅夫^[8]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角度,强调产业升级需要依托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政府适度支持;刘志彪等^[9]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出发,指出区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和要素流动受阻会诱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时建中^[10]则从公平竞争审查和竞争规则完善角度,强调治理“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创新权益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这些研究从产业升级、市场分割、地方治理和公平竞争等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随着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国内研究也逐渐转向平台经济、制造业内卷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等具体场景。在平台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指出,流量导向、零和博弈认知、政策适配不足和监管滞后,容易推动平台主体陷入补贴大战、流量争夺和生态排他^[11];在制造业领域,研究者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价格内卷和链条内卷的形成机制,认为内外需变化、平台崛起、产业链重整和企业数量变化共同影响竞争行为^[12];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等新兴产业领域,相关研究则揭示了价格战、技术路线竞争、产业平台竞争和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之间的复杂关联^[13]。由此可见,“内卷式”竞争并非单一行业现象,而是多主

体、多场景、多机制共同作用的系统性问题。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从理论基础、形成机制、现实表现和治理路径等方面对“内卷式”竞争作出较多阐释,但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视角相对分散,对供需结构、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和主体行为之间的耦合关系揭示不足;二是对地方政府、企业和平台经济等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表现及跨域传导机制分析不够;三是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质生产力培育 and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结合仍有深化空间。基于此,本文立足中国经济转型与制度语境,采用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和系统分析方法,厘清“内卷式”竞争的生成逻辑、表现形态、影响和治理策略。理论上,本文尝试构建“市场压力—能力约束—制度推力—行为强化”的分析框架;实践上,为整治无序内卷、破除市场壁垒、激发企业创新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政策参考。

(二)“内卷式”竞争的概念界定与操作化识别

在理论溯源与文献梳理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内卷式”竞争的适用领域、主体范围与识别标准。“内卷式”竞争可以发生于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也可能出现在教育、就业、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等不同领域。但由于不同领域的竞争目标、资源类型、行为机制和治理规则存在差异,本文不对上述各种类型的“内卷式”竞争进行统一分析,而是将研究范围限定为经济领域。本文重点考察企业、平台经营者等市场主体,以及通过招商引资、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市场准入和地方保护等方式影响市场竞争的地方政府。其中,企业和平台经营者是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地方政府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但其政策行为能够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竞争条件,因此属于本文所说的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政策行为主体。本文涉及的城市之间、省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指以地方政府为行为载体的区域政策竞争。

在上述范围内,“内卷式”竞争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竞争强度

提高。良性竞争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服务优化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社会福利,其竞争投入能够改善效率、提升质量和创造价值;而“内卷式”竞争则是在资源约束、有效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不够、制度激励扭曲和相关主体行为偏差共同作用下,企业、平台经营者及相关地方政府持续增加价格、产能、营销、补贴、流量和政策优惠等竞争性投入,却未能带来行业效率、产品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反而导致利润压缩、资源错配、创新弱化和负外部性扩散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尝试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语境下,对“内卷式”竞争进行系统性解释。具体而言,供需结构性失衡构成“内卷式”竞争生成的市场压力,创新能力不足构成其持续固化的能力约束,市场分割与地方行政干预构成其扩散蔓延的制度推力,博弈困境与认知偏差则强化了市场主体的短期化行为选择,即“市场压力—能力约束—制度推力—行为强化”的传导逻辑,最终外化为低收益、低质量、高消耗、高传导的共性特征。

从识别标准看,“内卷式”竞争具有“低收益、低质量、高消耗、高传导”的共性特征。第一,低收益是同质化竞争下核心价值收缩的典型表现。市场主体难以凭借差异化优势掌握定价主动权,只能以低价、补贴、让利等方式争夺市场份额,进而拉低全行业盈利水平。企业端表现为价格内卷持续压缩利润空间,平台端表现为低价补贴侵蚀商户经营收益,地方政府端表现为过度招商优惠加重财政收支压力。第二,低质量是竞争锚点偏离后的发展质量下降。各类主体受短期收益导向驱动,易忽略品质升级、技术迭代、服务优化等长期发展布局,转而将资源投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导致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创新质量难以同步提升。第三,高消耗是低效竞争下资源投入与价值产出之间的不匹配。生产端表现为产能冗余、要素闲置和营销成本攀升,地方层面表现为产业布局趋同和公共资源浪费,平台层面表现为流量争夺、补贴大战,同时伴随虚假创新造成的资源耗散。第

四,高传导是“内卷式”竞争区别于局部性竞争失序的重要特征。由于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区域政策链和平台生态链高度关联,内卷行为容易经由上下游价格传导、区域政策模仿、平台规则扩散和消费者预期变化等路径,快速渗透至不同主体和不同场景。

据此,本文将“内卷式”竞争从一般性、描述性概念进一步转化为可观察、可比较、可检验的分析框架。基于低收益、低质量、高消耗和高传导 4 个特征维度,构建初步操作化指标体系,以增强概念识别的清晰度和后续实证研究的可延展性(见表 1)。

表 1 “内卷式”竞争的操作化识别指标体系

特征维度	理论内涵	可观测指标
低收益	竞争投入增加但收益水平下降,利润空间被压缩	行业营业利润率、企业毛利率、企业净利率、亏损企业占比、平台综合佣金费率、招商引资财政奖补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园区(或招商项目)亩均税收
低质量	低价竞争、模仿竞争和短期逐利导致质量改进不足	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率、每万笔交易消费投诉量、退货退款率、售后纠纷率、订单履约准时率、服务违约率/取消率、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比重
高消耗	资源投入增长快于价值产出增长,形成低效投入和重复建设	产能利用率、存货周转天数、销售与营销费用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园区土地利用率、标准厂房空置率
高传导	内卷行为沿产业链、区域链和平台生态链扩散	上游价格向下游价格传导系数、上下游利润联动系数、区域间同类产品价格联动系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地方产业政策文本相似度、平台互联互通投诉/处罚件数、商户多平台经营率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指标主要用于提高“内卷式”竞争概念的可观察性,并不意味着单一指标即可直接判定某一行业或主体存在内卷,仍需结合利润变化、质量表现、资源消耗和负外部性扩散等进行综合判断。

二、“内卷式”竞争多维度要素耦合的内在运行逻辑

“内卷式”竞争是供需结构、创新能力、制度环境与市场主体行为多要素动态耦合的系统性现象,其学理基础是有限资源约束下的低水平重复博弈,本质上是市场主体路径锁定引发的效率损

耗与价值贬损。需要说明的是,供需结构性失衡与创新能力不足并非同一层面的重复解释。前者主要揭示市场增量空间收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配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后者主要说明企业为何难以及时通过技术升级、产品迭代和模式创新跳出同质化竞争。供需失衡回答为什么进入存量竞争?创新不足回答为什么难以摆脱存量竞争?二者分别构成“内卷式”竞争生成的市场压力和能力约束。

从整体看,“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市场压力—能力约束—制度推力—行为强化”连续传导的过程:供需结构性失衡压缩市场增量空间,创新能力不足削弱差异化竞争能力,市场分割与地方行政干预扭曲资源配置和企业激励,博弈困境与认知偏差强化市场主体的短期化行为选择。四类因素相互叠加、循环强化,最终形成投入递增、收益停滞、内耗加剧的低效循环。

(一)供需结构性失衡:市场压力

供需均衡理论表明,供需精准匹配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核心基础。当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持续固化,市场增量空间便会收窄,市场主体无法通过有效供给创造增量需求,被迫转入存量博弈,行业内卷随之滋生^[14]。尽管我国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业规模,工业体系门类完备、供给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但供给过剩、需求偏弱的结构性短板长期存在,为行业内卷提供了现实土壤。

从需求端看,有效需求释放不足叠加外需持续承压,是企业转入存量竞争的重要原因。依据有效需求理论,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水平、居民消费预期是决定有效需求的三大关键变量,而我国在这三方面均存在短板。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社保覆盖与保障力度不足,直接消弱居民消费信心与消费意愿。加之全球贸易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市场持续萎缩,部分行业原有产能面临更大的消化压力,进一步加剧存量竞争。

从供给端看,过去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导致部分行业累积了庞大的基础产能。当增量需

求放缓时,庞大的产能基数无法被市场有效消化,市场主体便更容易转向低价竞争、重复投入和份额争夺。这种供需结构性失衡,形成催生“内卷式”竞争的市场压力。

(二)创新能力不足:能力约束

面对供需失衡的存量博弈,破解行业内卷、摆脱低水平发展困境的关键是创新驱动。创新理论表明,企业创新能力缺失正是行业难以摆脱存量竞争、内卷状态持续固化的内在约束^[15]。企业若能在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创新上停滞,即使面对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新需求,也难以将其转化为新的产品供给和市场空间。

具体而言,我国部分企业核心技术储备仍显不足,部分关键环节仍存在短板,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研发投入结构看,创新能力不足体现得较为直观。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36 326.8亿元,增长8.9%,R&D经费投入强度为2.69%,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为6.88%;分产业部门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为1.64%,制造业为1.8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为3.35%^[16]。这表明,我国研发投入总量持续增长,但基础研究占比、制造业整体研发强度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仍存在提升空间。

由于高端产品与核心零部件供给短板仍未完全补齐,部分企业难以适配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需求,容易扎堆中低端赛道,采取跟风复制、压缩成本等粗放经营策略。此外,研发投入结构不均衡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也会加剧能力制约。虽然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研发投入的主体,但部分传统制造企业研发强度偏低,原创性技术积累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仍有提升空间。加之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人才供给和中试转化平台建设仍需完善,部分企业难以通过差异化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最终固化了内卷存续的能力基础。

(三)市场分割与地方干预:制度推力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资源

高效配置、破解低水平内耗的关键制度基础^[17]。区域市场壁垒和地方政府不当行政干预,会损害市场公平、降低运行效率,并限制要素跨区域流动,进而催生同质化重复建设,成为行业内卷扩散的核心制度因素。

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不当市场干预会改变企业成本收益结构。当前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仍较为重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就业吸纳和项目落地等指标,各地为争夺项目资源,容易通过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奖补等政策吸引企业投资。这类政策短期内能够降低企业进入成本,但若缺乏统筹协调和质量约束,可能诱导企业将政策红利纳入扩张决策,弱化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性。

第二,市场分割会削弱要素自由流动和规模经济形成。地方政府设置行政壁垒、隐性准入门槛或本地保护安排,会形成碎片化市场,使企业陷入本地保护和外地壁垒并存的双重约束。企业难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和实现专业化分工,只能在有限市场空间内开展低水平竞争,进而放大内卷压力。

第三,不合理产业政策会强化同质化布局。部分地方政府在产业选择上容易受热点产业、示范工程和短期政绩目标影响,未能充分研判市场需求、产业规律和本地资源禀赋,导致区域产业规划趋同、园区定位趋同和扶持政策趋同。由此形成的制度激励,会使企业在相似赛道中集中进入、重复扩产和低价竞争,推动区域层面的政策竞争向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传导。

(四)博弈困境与认知偏差:行为强化

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决策行为受博弈困境与认知偏差双重约束,容易形成个体理性、集体非理性的结果,逐步演化出低水平内耗、低效循环的内卷状态^[18]。在市场空间受限、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创新收益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短期更为安全、更为可见的竞争策略,而不是投入周期更长、风险更高的创新活动。

一方面,企业个体理性选择可能导致行业整体非理性结果。单个企业通过降价、扩产、加大营销投放等方式争夺市场份额,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多数企业采取相同策略时,行业整体便会出现投入增加、利润收窄、效率下降的结果^[19]。企业越担心失去市场份额,越倾向于被动跟进同类竞争策略,最终形成难以摆脱的低水平重复博弈。

另一方面,认知偏差会进一步强化内卷惯性。企业因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市场需求误判,容易高估短期市场空间,低估同业同步进入和同步扩张带来的风险。在内卷格局下,“规模优先、价格制胜”的认知会影响企业决策,创新的高投入、高不确定性又降低了企业主动转型的动力,使其更倾向于维持既有经营方式。尤其是部分传统制造企业深陷粗放发展惯性,面对竞争压力时更容易选择成本压缩、模仿跟随和低价竞争,而不是通过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重塑竞争优势。

综上,“内卷式”竞争是供需结构性失衡、创新能力不足、市场分割与地方行政干预、博弈困境与认知偏差四类要素协同作用、循环传导的结果。供需失衡压缩市场增量空间,创新不足削弱差异化竞争能力,市场分割与地方干预扭曲资源配置和企业激励,博弈困境与认知偏差强化市场主体的短期化行为选择。上述因素共同塑造了“内卷式”竞争的生成机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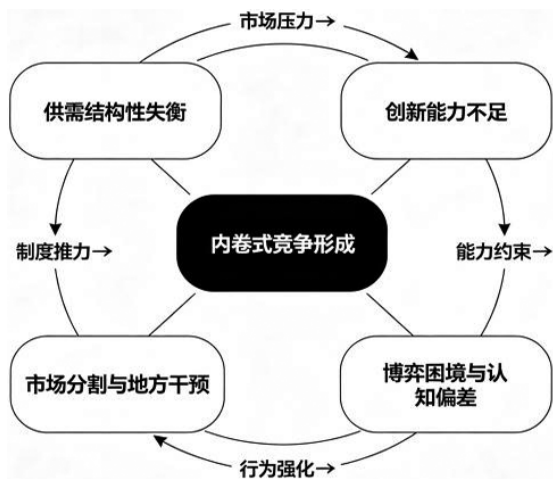


图 1 “内卷式”竞争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内卷式”竞争的多主体表现形态与场景延展

前文已从供需结构、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和主体行为等方面分析了“内卷式”竞争的生成机制。本部分转向其现实表现,重点考察地方政府、企业和平台经济等主体在不同场景中的外化形态。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层面主要表现为招商竞争、产业布局趋同和区域保护;企业层面主要表现为价格、产能和营销竞争同质化;平台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流量争夺、算法竞争和生态排他。

(一)地方政府政策竞争:招商、产业布局与区域保护

地方政府政策竞争是“内卷式”竞争在区域治理层面的集中表现。其外在形态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分割,而是通过招商优惠、产业扶持、园区建设和区域保护等具体政策工具,表现为地方之间争项目、争企业、争产能、争资源。由此形成的政策竞争,容易推动地方产业布局趋同,并进一步向产业端和企业端传导。

首先,招商内卷表现为政策优惠的逐层加码。各地为争夺重点项目和龙头企业,竞相推出税收返还、低价供地、财政奖补、贷款贴息、能耗指标倾斜等优惠举措。短期看,这有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增强地方项目吸附能力;但若区域之间同步加码,便容易形成政策逐底竞争。地方之间的竞争重点从营商环境、产业配套和创新能力建设,转向补贴强度、土地价格和财政让利,导致招商行为偏离高质量发展导向。

其次,产业同质化内卷表现为地方产业规划和园区建设的趋同化扩张。部分地区易受热点产业、示范工程和短期绩效目标影响,集中布局新能源、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却未能充分匹配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市场需求和配套能力。产业规划趋同、园区定位趋同和扶持政策趋同,导致相邻地区在同一产业链环节重复建设,既推高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投入,也压缩本土特色产业和差异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最后,区域保护表现为本地优先和隐性市场壁垒。部分地方在政府采购、项目配套、市场准入、资质认定和要素配置中偏向本地企业,短期内能够保护本地产业和就业,但也容易削弱企业面向全国市场开展竞争的动力,使企业更依赖本地市场、地方订单和政策庇护。与此同时,外地企业进入受阻、跨区域协作不畅和产业链分工受限,致使企业难以通过全国统一市场扩大规模经济和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在这种条件下,本地企业容易停留在低端制造、低价供给和重复配套环节,外地企业则被迫在不同区域重复设点、重复建设,进一步放大产业链条中的低效投入和同质化竞争。

(二)企业竞争行为响应:价格、产能与营销同质化

企业是“内卷式”竞争最直接、最可观察的行为主体。其现实表现主要集中在价格、产能和营销3个层面:价格层面表现为持续让利和低价抢单,产能层面表现为同步扩张和重复投入,营销层面表现为流量争夺和渠道造势^[20]。

首先,价格内卷是企业同质化竞争的核心表现。对于产品差异化不足、消费者价格敏感度较高、技术壁垒不强的行业而言,企业往往倾向于通过降价争夺市场份额,进而引发“降价—利润收窄—再降价”的循环。现实中,不少企业以低价促销为主要竞争策略,弱化研发与产品迭代,部分甚至通过低于合理成本的价格争夺订单以维持市场份额,这一现象在家电、光伏等行业较为突出。以光伏行业为例,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光伏制造行业运行情况》显示,2024年全国光伏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10%,其中多晶硅产量超过182万t,组件产量达到588GW;但全年主要光伏产品呈现“量增价减”态势,多晶硅、组件价格分别同比下降39.5%、29.7%^[21]。这一数据并不意味着价格下降本身就等同于低端竞争,而是表明在产能快速释放、价格持续下行和利润承压等多重因素并存的条件下,部分环节可能存在以规模扩张和低价抢单替代差异化竞争的倾向。

其次,产能内卷表现为企业同步扩张和重复投入。微观上,单一企业扩产具有抢占窗口期、降低单位成本和增强供应链议价能力的短期合理性;但从行业整体看,如果多数企业基于相似预期同步扩产,而有效需求增长、技术消化能力和市场吸纳能力未能同步提升,就会导致总产能超过市场需求^[22]。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行业为例,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5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2%,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9%^[23]。上述数据不能直接证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但能够说明在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部分环节面临产能消化、价格下行和收益承压的共同压力,进而为观察产能内卷提供现实背景。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锂离子电池行业运行情况》显示,2024年全国锂电池总产量1170GWh,同比增长24%,其中动力型锂电池产量826GWh,锂电池装机量超过645GWh,同比增长48%;但受锂电池产品价格下跌影响,全年全国锂电池出口总额为4348亿元,同比下降5%^[24]。上述数据表明,新能源产业链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部分环节也面临扩张较快、价格下行和收益承压多重因素并存的阶段性矛盾。

最后,营销内卷表现为企业将过多资源投入流量争夺和渠道造势^[25]。数字经济背景下,流量成为竞争关键,部分消费品企业将大量资源投入渠道推广、达人带货和平台投流,容易挤占研发与品质管控投入。以水羊股份为例,其《2025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率约为48.94%,研发费用率约为1.75%,销售费用约为研发费用的27.99倍^[26]。这从企业财务结构层面反映出,消费品行业流量竞争可能对研发投入和长期价值创造形成挤压。快消品行业明星代言、流量投放同质化严重,直播电商领域虚假宣传、过度营销乱象突出。这类竞争未必创造真实市场增量,却可能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压缩产品研发、品质服务和长期品牌建设投入。

(三) 平台经济场景延展: 流量争夺、算法竞争与生态排他

平台经济领域的“内卷式”竞争,是上述竞争逻辑在数字场景中的延展。平台兼具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双重属性,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后,平台主体容易围绕流量、算法、商户资源和用户黏性展开高强度竞争。其现实表现主要包括低价补贴与流量争夺、同质化功能竞争、生态排他和数据壁垒等。

第一,价格与流量竞争表现为平台通过补贴、投流和算法分发抢占市场份额。现实中,电商平台依靠低价策略持续压缩中小商户利润空间,出行、外卖等平台通过补贴和流量倾斜扩大用户规模,部分平台还利用大数据算法实施差异化定价,变相侵害消费者权益^[27]。对于平台内商户而言,流量规则和排序机制直接影响其经营收益,一旦平台竞争过度转向低价和流量倾斜,中小商户便容易被卷入价格压缩和投流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之中。

第二,同质化虚假创新表现为平台功能、商业模式和内容生态趋同。部分平台舍弃底层核心技术研发,照搬商业模式、堆砌冗余功能制造创新表象,持续耗散行业整体创新潜力。例如,直播电商普遍沿用低价引流、直播带货、刷单冲量等同质化路径,短视频平台功能架构与内容生态高度趋同,甚至依靠低俗内容博取流量。这类形式化创新难以真正提升平台服务质量和技术能力,反而容易造成用户注意力争夺、内容供给重复和行业创新质量下降。

第三,生态排他表现为平台依托数据、流量和市场优势设置竞争壁垒。部分头部平台凭借数据优势设置准入门槛,通过股权投资、独家合作、链接限制、接口封闭等方式构建闭环生态,挤压中小平台和商户空间^[28]。同时,部分平台提高佣金、设置不合理条款,侵占商户与消费者权益。例如,部分电商平台提高商户佣金,社交平台限制用户跳转其他链接,均不利于平台经济开放、协同发展。进一步看,平台处于连接消费者、商户、劳动者、供

应链和广告市场的枢纽位置,其竞争方式会沿平台生态向多个主体传导,形成更广范围的内卷扩散。

四、“内卷式”竞争阻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负面影响

“内卷式”竞争会扰乱行业运行秩序、挤压企业创新动能、削弱跨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并损害消费者、劳动者和区域发展等多元主体权益,最终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扰乱行业运行秩序, 锁定低水平发展路径

产业健康发展的核心前提是有序竞争、产能合理、定价稳定与升级动能充足,而“内卷式”竞争打破产业均衡发展状态,扰乱行业运行秩序,推动全行业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严重阻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其一,无序竞争破坏行业市场规则。无底线价格战、赛道扎堆、流量恶性争夺、地方保护主义等内卷行为,会扭曲市场定价机制,导致行业定价体系失效,产品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优质优价的市场交易原则难以落地,故行业竞争重心不得不从技术、品质、服务转向成本挤压与资金内耗,虚假宣传、抄袭仿冒、恶性倾销、低端模仿等乱象频发,行业自律机制失效,整体规范化水平持续下滑^[29]。

其二,非理性扩张扰乱行业供需秩序。热点领域扎堆布局、企业同步扩产,使部分细分赛道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供给超出市场有效需求。过剩产能若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有序出清,行业便容易长期处于开工不足、库存积压和低价清库存状态。这不仅扰乱正常供需关系,也会削弱产业集中力量推进技术突破、模式创新和结构升级的能力,使整个行业被产能过剩问题持续拖累^[30]。

其三,长期同质化竞争导致产业升级受阻。当行业内企业普遍适应低定价、低投入、低创新的生存方式后,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内在动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滞后,智能化改造、数字

化转型、绿色化升级推进缓慢。产业长期停留在加工组装、低端制造、基础服务等中低附加值环节,产业链整体盈利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无法适配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需求,最终阻滞产业现代化转型进程。

(二)挤压企业创新动能,弱化长期竞争优势

企业是创新主体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稳定研发投入、持续技术更新与价值创造能力是其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但“内卷式”竞争会扭曲企业经营决策逻辑,使企业将短期生存置于长期发展之上,持续消耗创新活力,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同质化价格战中,企业长期陷入价格比拼与成本消耗的死局,营收空间持续压缩,微薄利润仅能维持基本生产,难以积累稳定研发资金。为保住市场份额,多数企业被迫砍掉技术研发、工艺升级等长期投入,采取模仿抄袭、粗放压本的短期策略,导致技术更新放缓、研发项目延期和创新成果产出不足,削弱企业长期竞争优势。

更关键的是,“内卷式”竞争易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失序,坚持品质升级、持续创新的企业因成本较高处于劣势,而违规降本、偷工减料的企业凭借低价抢占市场。长期来看,优质企业创新意愿弱化,行业底线下移,企业陷入不创新难生存、创新又难盈利的两难困境,丧失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能力,只能被锁定在低端发展路径。

(三)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削弱跨区域协同效率

与行业内部秩序失范不同,本部分重点讨论“内卷式”竞争在跨区域、跨行业和跨要素层面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行业秩序失范主要表现为价格机制扭曲、竞争规则弱化和供需关系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则主要表现为市场分割、要素错配、区域壁垒和统一大市场建设受阻。二者存在结果关联,但分析层次不同。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内卷式”竞争引发的地方政策比拼、产业同质化布局 and 区域保护行为,会割裂区域市场联系,削弱跨区域

产业分工和要素协同效率,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首先,地方政府间的政策比拼与同质化产业布局,会加剧市场分割态势。各地通过差异化税收减免、用地补贴、财政兜底等政策营造局部优势,争夺产业资源,同时通过设立隐性行政门槛保护本地企业、排斥外地市场主体,容易人为切断区域间产业协作与市场联动。产业同质化布局导致区域分工边界模糊、功能定位重叠,区域互补协作能力弱化,违背区域协同与一体化发展规律。

其次,在同质化竞争导向下,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核心生产要素出现严重错配与低效利用。优质资源过度向低端同质化产业倾斜,热门赛道呈现资源扎堆、产能过剩的失衡格局,而高端产业、新兴业态及短板领域的要素供给却严重短缺。同时,要素跨区域流动门槛偏高,劳动力流动受阻、科技成果转化不畅、资本配置呈现碎片化态势,各类要素难以依据市场需求实现自由流动与最优配置。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下滑,会削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力,进一步压缩宏观经济潜在增长空间。

最后,从宏观层面看,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的双重作用,会弱化我国产业体系的整体性与协同性,难以充分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产业集群与核心竞争力。碎片化市场格局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阻碍创新要素全域流转与技术外溢效应释放,最终削弱实体经济整体竞争力,限制了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四)损害社会多元主体权益,阻滞共同富裕进程

经济领域竞争模式深刻影响社会发展质效。“内卷式”竞争的负外部性持续向社会领域传导,不仅侵害消费者、劳动者等多元主体合法权益,还可能拉大区域、行业及群体发展差距,背离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给社会稳态运行与长远发展埋下潜在风险。

一是对消费者而言,低价恶性竞争可能伴随品质下滑,一些企业为压缩成本,降低生产标准、

削减核心配置、简化生产流程、放松质量管控,大量价质不符的低端产品流入市场,致使商品安全性、实用性与耐用性持续下降。部分企业为争夺流量,开展虚假宣传、炒作热点、设置消费陷阱;平台内卷引发的大数据杀熟、不公平格式条款、配套服务缩水等问题,进一步侵害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长期来看,低端供给结构难以适配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制约消费品质提升与居民生活质量改善。

二是对劳动者而言,行业盈利下滑与企业成本挤压的压力最终向用工端传导。用人单位普遍通过降薪、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削减社保福利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导致超时用工、薪资停滞、劳动保障不足等问题。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用工模式,直接降低劳动者获得感与满意度,限制居民收入合理增长,阻碍中等收入群体扩容,从收入分配层面阻滞共同富裕推进。

三是对区域发展而言,地方产业同质化与招商引资恶性竞争,会加剧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凭借财政优势持续出台扶持政策,吸引优质产业与资源集聚;欠发达地区若盲目跟风布局新兴产业,脱离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不仅难以实现赶超,还会加重财政负担、浪费公共资源。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导致差异化发展优势丧失,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难以缩小,城乡资源双向流动通道受阻,进一步增加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地难度。

最后,“内卷式”竞争引发的资源错配、效率浪费、环境负担加重等问题,会加剧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导向相悖,对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深远负面影响,多维度阻滞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五、多维度协同发力、标本兼治的系统性治理策略

“内卷式”竞争治理的重点不是简单限制竞争,而是通过规则重塑、结构优化和行为引导,推动市场竞争从低价内耗、补贴比拼和流量争夺,转向以创新、质量、效率、服务和品牌为核心的价值

竞争。

(一)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制度性梗阻

治理区域层面的“内卷式”竞争,关键在于破除地方保护、隐性壁垒和政策同质化竞争,推动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实施主体上,应由发展改革、市场监管、财政、审计等部门统筹推进,地方政府负责具体落实。执行机制上,应重点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建设的区域性政策,统一市场准入、产权保护、要素流转、公平竞争和监管执法规则,减少以税收返还、低价供地、财政奖补等为主要手段的招商竞争,防止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加码争项目、争产能和争资源。

同时,应优化产业政策协调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依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布局,避免盲目追逐热点产业和重复建设。产业政策应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创新能力培育和公共服务供给,减少低效普惠补贴,更多地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和公共平台建设。评估方面,可重点考察违规地方政策清理情况、市场准入公平性、要素跨区域流动便利度、重复建设项目压减情况和经营主体异地经营成本变化,以检验统一市场建设成效。

(二) 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破解同质化困境

企业同质化竞争的根源之一在于供给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和差异化竞争能力偏弱。因此,破解“内卷式”竞争必须把提升供给质量和增强创新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实施主体上,应由科技、工信、财政、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等部门协同推进,企业承担研发投入、成果转化和质量提升的主体责任。执行机制上,应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支持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基础零部件、先进工艺和高端产品开展持续研发,推动竞争重心从成本压缩和价格让利转向技术升级、品质提升和品牌塑造。

同时,应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对低效产能、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应推动其兼并重组、转型升级或有序退出;对龙头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应通过金融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研发平台共建和产业链协同机制提升其创新能力。评估方面,可重点观察研发投入强度、核心专利和标准参与情况、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产能利用率、落后产能退出情况、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情况和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以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真正推动企业摆脱低端同质化竞争。

(三)扩大内需提振需求侧,缓解供需结构错配

供需结构性失衡是“内卷式”竞争生成的重要市场压力。当有效需求不足、存量竞争加剧时,企业更容易通过低价抢单、重复扩产和营销投放争夺有限市场。因此,治理“内卷式”竞争还需要从需求侧发力,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更稳定的市场空间。实施主体上,应由商务、财政、人社、发展改革、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推进,地方政府结合区域实际落实消费扩容政策。执行机制上,应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消费预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同时,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加高品质、个性化、绿色化、服务化产品供给,推动消费结构从低价导向转向品质导向。还要释放县域、农村和服务消费潜力,完善下沉市场商业设施、物流体系和数字消费基础设施,拓展新型消费、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场景,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动力。评估方面,可重点考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县域和农村消费活跃度、服务消费占比、消费投诉处理情况和中高端产品供给增长情况,以判断需求扩容是否有效缓解存量竞争压力。

(四)推动企业长期主义转型与行业自律协同,重塑价值竞争生态

企业是“内卷式”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也是治理转型的关键主体。实施主体上,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应承担转型主体责任,行业协会、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行业协同与创新合作责

任,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规则指导和行为约束。执行机制上,企业应改变“拼价格、拼补贴、拼流量”的短期竞争思维,转向“拼技术、拼品质、拼服务、拼品牌”的长期价值竞争,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创新、质量管理、用户服务和品牌建设,避免盲目扩产、跟风投资和过度营销。

行业层面,应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产品质量、价格行为、营销规范、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规则,明确低价倾销、虚假宣传、模仿抄袭、恶意刷单等行为边界。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可围绕共性技术、质量标准和供应链协同共建联合创新平台,减少重复投入和低效内耗。评估方面,可重点考察企业研发费用率、质量合格率、客户复购率、品牌溢价能力、行业投诉数量、低价倾销案件数量、联合研发项目数量和产业链协同效率,以衡量企业是否真正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

(五)夯实竞争法治监管政策,守住公平底线

法治监管是遏制“内卷式”竞争的底线工具。实施主体上,应由市场监管、网信、工信、商务、司法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规则制定、执法监管、信用约束和司法救济相衔接的治理体系。执行机制上,应进一步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价格监管、平台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规则,明确低价倾销、虚假宣传、平台排他、算法歧视、流量操纵、恶意补贴等行为的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增强监管规则的可预期性和约束力。

在执法层面,应聚焦新能源、平台经济、消费品、地方招商等内卷高发领域,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和数字化监测,提高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现、处置和惩戒能力。对以低于成本价格排挤竞争对手、通过平台规则损害商户和消费者权益、借助地方保护阻碍公平竞争等行为,应依法及时予以纠偏。同时,应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完善破产清算、强制注销、产能出清和职工安置衔接机制,推动低效企业和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评估方面,可重点考察违法线索发现率、案件办理周期、处罚执行率、重复违法率、破产办理效率、落后产能退出情

况和资源再配置效率,以检验竞争法治监管的实际效果。

综上,治理“内卷式”竞争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只有在治理目标上坚持从低水平同质化博弈转向高质量价值竞争,在治理机制上明确“谁来执行、如何执行、如何评估”,在治理路径上统筹统一市场建设、供给侧改革、需求扩容、企业转型、行业自律和法治监管,才能有效打破低效内耗循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产业升级动能,并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六、结语

本文围绕“内卷式”竞争的生成逻辑、表现形态、负面影响与治理路径展开了系统分析。研究认为,“内卷式”竞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加剧,而是在有效需求不足、创新能力偏弱、市场分割与地方不当干预以及市场主体短期化行为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状态。其突出问题不在于竞争本身,而在于竞争投入持续增加却未能同步带来效率提升、质量改进和福利增进,反而诱发利润压缩、资源错配、创新弱化和负外部性扩散,进而对高质量发展形成持续性制约。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市场压力—能力约束—制度推力—行为强化”的分析框架,并据此考察了“内卷式”竞争在地方政府政策竞争、企业同质化竞争和平台经济竞争中的现实表现。研究发现,供需结构性失衡压缩了市场增量空间,使市场主体更易转入存量博弈;创新能力不足削弱了差异化竞争和价值创造能力,使低水平竞争状态难以摆脱;市场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扭曲了要素流动与激励结构,放大了同质化扩张和重复建设;博弈困境与认知偏差则进一步强化了主体的短期化行为选择,推动“内卷式”竞争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持续传导和相互叠加。由此可见,“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一种多因素耦合、多主体参与、跨场景扩散的系统性经济现象。

本文进一步表明,“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具有多维度外溢特征。它不仅会扰乱行业运行秩序、

削弱企业创新动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会经由产业链、区域链和平台生态链向消费者、劳动者和地方财政等多元主体传导,进而加剧无效内耗、抬升制度成本,并削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现实基础。因此,对“内卷式”竞争的治理,不能停留于对单一价格战、补贴战或招商竞争的个别纠偏,而应立足其系统性成因,统筹推进规则重塑、结构优化与行为引导。

基于上述分析,破解“内卷式”竞争应坚持系统治理、分类施策和标本兼治。一方面,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破除地方保护、隐性壁垒,遏制政策同质化竞争,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规则统一;另一方面,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为重点,增强企业差异化竞争能力,推动竞争重心由价格、补贴和流量转向技术、品质、服务和品牌。同时,还应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为企业转型提供更稳定的市场预期,通过强化行业自律与竞争法治监管,及时查处低价倾销、平台排他、虚假宣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行为,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动、行业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属于理论分析与案例解释研究,文中所使用的行业数据、政策材料和典型案例,主要用于呈现现实背景、辅助机制阐释和提供现象佐证。受数据可得性和研究篇幅限制,本文尚未对“内卷式”竞争的4类特征开展系统量化测度,也未进一步构建统一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续研究可在本文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行业面板数据、企业微观数据、区域政策文本和平台交易数据,对“内卷式”竞争的识别、传导和治理效果开展更为系统的计量检验,以进一步增强相关研究的实证解释力,提升政策评估参考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J]. 求是, 2025(13): 4-8.
- [2]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3]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4]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 [5]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et 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2): 701-728.
- [7]HUANG P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 – 1988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林毅夫. 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9(2): 148-153.
- [9]刘志彪. 全国统一大市场[J]. 经济研究, 2022, 57(5): 13-22.
- [10]时建中.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若干问题[J]. 行政管理改革, 2017(1): 43-46.
- [11]欧阳日辉, 刘璇. 数字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发生机制、潜在风险与破解对策[J]. 财经问题研究, 2025(3): 3-19.
- [12]黄群慧, 叶其楚. 中国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 改革, 2025(6): 13-27.
- [13]邓洲. 新兴产业“内卷式”竞争的表现、成因和治理思路[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5(5): 32-36.
- [14]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 London: Macmillan, 1936.
- [15]李政. 创新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进展及趋势展望[J]. 经济评论, 2022(5): 35-50.
- [16]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25-09-29) [2026-06-01].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509/t20250929_1961429.html.
- [17]新华社. (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EB/OL]. (2022-04-10) [2026-05-08].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2022-04/10/c_1128547474.htm.
- [18]TVERSKY A, KAHNEMAN 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biases in judgments reveal some heuristics of thinking under uncertainty[J]. Science, 1974, 185(4157): 1124-1131.
- [19]JANN O, SCHOTTMÜLLER C. Correlated equilibria in homogeneous good Bertrand competition [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2015(57): 31-37.
- [20]曹建海. 过度竞争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21]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 年全国光伏制造行业运行情况[EB/OL]. (2025-02-27) [2026-06-01].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dzxx/art/2025/art_cf341b33d6ff4249baf36cd7b4068c75.html.
- [22]林毅夫, 巫和懋, 邢亦青.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 经济研究, 2010, 45(10): 4-19.
- [23]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 年 12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EB/OL]. (2026-01-14) [2026-06-01]. https://www.miit.gov.cn/jgsj/zbyz/qcgy/art/2026/art_4c5ed7009d21485da32b2a01abcf2819.html.
- [24]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 年全国锂离子电池行业运行情况[EB/OL]. (2025-02-27) [2026-06-01]. https://www.miit.gov.cn/gyhxxhb/jgsj/dzxx/dzjc/art/2025/art_b6fabce541b094897b3f27eea54981762.html.
- [25]MIZIK N, JACOBSON R. Trading off between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appropriation: th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shifts in Strategic emphasis[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3(67): 63-76.
- [26]水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EB/OL]. (2025-08-22) [2026-06-01]. <https://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5-08-22/1224535152.PDF>.
- [27]ROCHET J C, TIROLE J.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4): 990-1029.
- [28]EISENMANN T, PARKER G, VAN ALSTYNE M. Platform envelop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32(12): 1270-1285.
- [29]金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5-18.
- [30]林毅夫.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J]. 经济研究, 2007(1): 126-131.